

权力转移中的地位承认

王梓元

【内容提要】 长久以来,学者们试图从实力对比、国内政体、经济与安全依存以及国际制度特征等国际或国内层面的结构条件,来解释崛起国修改现状的要求和守成国的回应方式。这些视角局限于崛起国与守成国基于各自固定的物质利益而做出的策略选择,它们较少注意到在互动过程中,非物质偏好发挥的作用。国际地位正是一种伴随着国家间互动而产生和发生改变的偏好。本文强调,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崛起国和守成国都会格外偏好地位。由于崛起国需要守成国的认可才能获得地位,而地位本身又可以增进崛起国在国际博弈中的主动权,地位承认带有特殊的战略意义。具体说来,守成国承认崛起国的地位将有助于崛起国成功地融入国际体系和拥护现状。相反,守成国拒绝承认或是错误认知守成国的地位诉求则可能加剧矛盾甚至引起霸权竞争。为了检验上述理论机制,本文对四个案例进行了考察,包括 1870—1871 年德国统一后确立大国地位、1896 年英美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的和解、英德霸权竞争的开端以及 19 世纪末英德在远东问题上的结盟谈判。这些案例突出了地位承认问题可以有力地塑造权力转移的结果。

【关键词】 权力转移 地位承认 霸权竞争 和平变迁

【作者简介】 王梓元,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电子邮箱:wangziyuan@cfau.edu.cn

权力转移是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动力之一。崛起国随着实力的增长会对国际秩序提出新的要求,而守成国对这些诉求的接纳程度和方式则会决定崛起国改变现状的决心。中国的崛起和大国竞争时代的来临让“权力转移”再次成为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焦点。在历史上,崛起国和守成国进行

合作并推动国际秩序和平变迁的案例并不常见,因此其中的经验更加弥足珍贵。19世纪末期,美英两国在西半球不仅成功管控了彼此的冲突,英国还主动承认了“门罗主义”的合法性,从而和平让渡了区域霸权,这一决定促使美国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并于半个世纪之后取代英国成为国际秩序的领导者。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俾斯麦完成德意志统一的过程并没有激起其他列强的联合抵制,英俄两国作为欧洲国际体系的联合霸主迅速承认了统一后的德国在西欧的大国地位,从而促使俾斯麦坚定地捍卫起欧洲秩序的稳定。然而,当俾斯麦之后的德国领导人更加进取地寻求国际影响的时候,他们很快就卷入了各种与英国的外交摩擦,这一过程加剧了英德两国对彼此意图的疑虑,并最终让两国走向了霸权竞争。这些现象差异体现出,权力转移并不必然导致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伴随权力转移而产生的竞争和互疑也是破坏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解释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互动结果不仅为历史学家带来了实证研究上的挑战,对于国际关系学者而言,它们还是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难题。

如何解释这些大国权力转移过程中产生的不同结果?长久以来,学者们试图从实力对比^①、国内政体^②、经济依存关系^③和国际制度特征^④等宏观的

①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Dale C.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Joshua R. Itzkowitz Shiffrin, *Rising Titans, Falling Giants: How Great Powers Exploit Power Shift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② John M. Owen, "How Liberalism Produces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2, 1994, pp. 87-125;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arles Lipson, *Reliable Partners: How Democracies Have Made a Separate Pea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Daniel M. Kliman, *Fateful Transitions: How Democracies Manage Rising Powers, from the Eve of WWI to China's Ascendanc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5.

③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London: Longman, 2004; Robert Jervis, *The Meaning of the Nuclear Revolu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④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Alastair Iain Johnsto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结构条件来解释崛起国和守成国的互动结果。这些理论为决策者和观察家们理解和思考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其中涉及的一些变量甚至可以帮助决策者发现或发展新的政策工具。^①不过,这些视角局限于崛起国与守成国基于各自的基本物质利益(譬如安全和贸易环境)而做出的策略选择,而较少注意到互动过程本身可能塑造和改变双方的偏好。^②借用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的名言,如果说“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成的”^③,那么权力转移的结果亦是国家间互动的产物。在历史上,正是决策者对彼此意图的认知和基于自身目标而实施的策略造成了各种出人意料的冲突与和平局面。在此过程中,结构性的条件可能受到修正、重塑或颠覆,而由互动所创造出的新结构又可能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本文强调,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崛起国和守成国都会格外偏好地位:崛起国在意得到地位承认,守成国在意维护大国地位。国际地位的“社会性”意味着崛起国需要守成国的认可才能获得地位,而地位的“相对性”又意味着获得了地位可以增进崛起国在国际博弈中的主动权。^④因此,地位承认带有特殊的战略意义。“地位承认”在定义上指的是,一国通过“象征尊重和顺从的姿态和礼仪”公开承认另一国家在国际等级体系中的特殊权益。国家间的交往仪式具有较高的公开性,因此提供了“地位符号”(status symbols),它们包括首脑会议、公开演说、国事访问和战略对话等形式,国家元首在这些仪式上的表现有助于协调各国对于等级格局的认知,并让他国

① Thomas J. Christensen,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 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1, No. 1, 2006, pp. 81-126.

② 罗伯特·杰维斯的著作在这一问题上做出了突破。见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然而,他低估了情绪在塑造偏好方面的重要作用,本文关注的“地位”偏好则是以情绪作为微观基础的。

③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1992, pp. 391-425.

④ 有些时候,“地位”这一术语被用来强调一国的实力和相对优势(譬如“实力地位”的表述)。本文中使用的“地位”一词强调的是“社会地位”(social status),即必须得到社会认可的优越或劣等身份。

认清一国声望的变化。^①需要指出的是,不是所有带有“承认”内容的言辞都等同于“地位承认”,只有一国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对他国表现出“尊重和顺从”态度才能达到地位承认的效果。守成国承认崛起国的地位将有助于崛起国成功地融入国际体系和拥护现状。相反,守成国否决或错误地认知崛起国的地位诉求则可能加剧矛盾甚至引起霸权竞争。在国际地缘政治的核心区域内,崛起国的地位诉求如果遭到守成国的否决,双方在此发生的冲突将加剧霸权竞争。相比之下,在相对边缘的区域内,尽管崛起国的地位诉求不会牵动大国利益格局,但是由于外交信号的模糊性和认知差异,地位承认也许依然不会发生,这会导致崛起国与守成国的互疑加深,并且为双方之后发生更大规模的冲突埋下伏笔。

本文首先阐述既有理论在探讨守成国与崛起国博弈问题上的局限性。第二部分强调地位承认在权力转移过程中的理论意义。第三部分将阐述地位承认的理论框架并提出可供实证检验的假设。第四至第七部分将展开案例研究,其中包括1870—1871年德国统一后确立大国地位、英美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的和解、英德在1905—1906年摩洛哥危机期间的地位博弈以及19世纪末英德在远东问题上的外交协商。

一、现有理论的局限性

权力转移过程中守成国与崛起国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问题。在长期的论争中,学者们引入和发展了诸多概念和理论用来描述和解释这一关系的演变和结果。四种学说在解释这一问题上颇具代表性,它们分别聚焦于实力对比、政体类型差异、经济依存关系和国际制度韧性。然而,上述学说的考察对象主要是国际和国内层面的宏观结构条件及其引起的机制和结果,而对于国家间互动博弈的过程关注不足。这一视角上的偏差导致它们在理论逻辑和实证考察上都有所欠缺。基于对它们的批判性反

^① Deborah Welch Larson, T. V. Paul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Status and World Order,” in Larson, Paul and Wohlforth, eds.,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1-12; 王梓元:《地位政治与中国崛起的地位伸张》,载《外交评论》,2021年第1期,第57页。

思,本文强调地位承认的重要性。

(一) 实力对比的变化

实力对比的变化是权力转移的突出特征。长久以来,学者们一般认为这一变化与大国冲突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具体说来,崛起国会试图利用其实力为自身攫取更大的利益和在国际体系中占据更多权益,而守成国由于缺乏必要的实力维持现有的局面,其打压崛起国的决心也会上升。^①上述断言植根于现实主义理论,也就是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由于缺乏统一的权威来制定规则和维持秩序,国家只得依赖自身实力来维持自身的生存、繁荣和荣耀。守成国难以预料崛起国是否以及何时会利用其实力改变现状,崛起国也难以预料守成国是否以及何时会利用其尚存的优势来打压自身崛起,因此,权力转移本身会加深国家间的互疑程度。在此情况下,崛起国和守成国都有充分的动机来向彼此施加压力,力图让对方让渡更多权益,这一过程极易导致冲突升级甚至爆发战争。

基于实力对比变化的解释简约而精致,易于让研究者在实证观察中捕捉到引起战争的关键证据,该学说因此具有极大的说服力。然而,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和大国博弈中诸多富有争议的细节,只通过实力对比变化来解释大国冲突依然存在不足。特别是,该学说容易让观察者对案例的选取产生偏见,即只考察大国间危机和战争发生的时段和事件,而不考察危机解决和权力转移过程中大国寻求合作的案例。譬如,19世纪末期英国在面临实力上升的德国时,会首先选择同德国结盟。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论视角,上述重大的历史事件尽管已得到历史学家的详述,但却难以得到国际关系学者的重视。

(二) 国内政体类型的差异

现实主义者强调实力对比变化是大国冲突的根源,而重视国内政治因素的学者则强调政体类型的差异可以调和或刺激大国之间的冲突。与现实主义者相比,这些学者相对乐观,认为大国冲突不是权力转移导致的必然悲

^①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Dale C.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剧。不过,与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古典自由主义学说不同的是,当今学者不再先验地认为民主国家必然偏好和平。在研究国家如何避免冲突的问题上,当今学者更多地借鉴了信号沟通、承诺可信度和身份差异等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并通过这些理论来考察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策略互动及后果。譬如,有学者强调,民主国家之间更善于缔结和维持合作协定。其原因在于,民主国家内部公众对领导人的监督以及具有绝对权威的国内立法可以增加国际承诺的可信度,而民主国家决策过程的相对透明性也可以增加他国的信任;最后,民主政体的开放性也有助于扩大合作的纽带和渠道。^①由于以上机制在民主和非民主国家的互动中难以运行,政体差异易于造成国家间的冲突。

有的学者更加强调民主国家间的规范与身份认同。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欧文(John Owen)就注意到,民主制度本身制约领导人卷入国际冲突的能力可能被高估了,而民主制度为领导人提供的规范和身份感让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将彼此视作可以合作的伙伴,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之间的领导人由于缺乏这种身份上的亲近感,所以更容易发生误解。^②在美国霸权秩序下,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互动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是否能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规范上找到一致。^③还有学者从意识形态的差异程度视角解释了历史上大国博弈的不同结果。^④

在上述研究中,学者们重视起了国家互动的微观过程,尤其是互动过程中出现的变量。然而,这些研究的着眼点主要限于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其政策含义则聚焦于当今非西方民主国家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挑战。这一理论视角容易夸大民主政体的特殊属性,而轻视政治博弈过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中决策者个体抱有的关切和焦虑。政体类型无法改变决策者寻求安全、权势与荣耀的一般动机,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策略。有研究显

① Charles Lipson, *Reliable Partners*;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② John M. Owen, "How Liberalism Produces Democratic Peace."

③ John M. Owen, "Transnational Liberalism and U. 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3, 2001/02, pp. 117-52.

④ Mark Haas,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1789—198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示,由于观众成本的压力和法治的约束,民主政体的精英们更加偏好通过非公开的军事行动与对手进行势力范围的竞争。^①此外,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会让谈判的对方掌握公开秘密承诺的主动权,并以此作为承诺可信度的担保。^②最后,不同政体的国家成功疏解战略猜忌的案例也的确存在,其中不乏大国和解的事例。^③这些研究表明,在微观互动上还存在大量的理论创新空间和未被充分考察的经验证据。研究崛起国与守成国的互动也需要吸收这一视角。本文的案例研究既关注政体类型相似的大国互动,也关注政体类型存在差异的大国博弈。在政体类似的崛起国与守成国的互动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政体上的特征是否真正增强了守成国与崛起国的相互信任?其信任的基础又是什么?在政体差异性较大的崛起国与守成国的互动中,值得关注的是:政体上的差异是否会加剧崛起国和守成国对彼此意图的怀疑?什么样的事件可以突出这样的差异?回应上述问题有助于澄清崛起国与守成国矛盾发生或深化的微观机制,也有助于让研究者发现政体差异以外的因素。

(三) 经济与安全依存

大国在经济与安全上的相互依存是冷战结束以来最为突出的国际现象之一。学者们一般认为,经济依存关系为国家之间创造了更多的共同利益。随着核武器的出现,大国在安全上的依存关系会让彼此在冲突中更加审慎。事实上,当今各国间的经济依存关系较之于19世纪更加广泛和复杂。有学者认为,与安全领域最为相关的是,全球资本的扩张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偏好从追求军事安全转向了追求经济繁荣,而且这些国家的规模和实力又

① Austin Carson, *Covert Conflic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Lindsey A. O'Rourke, *Covert Regime Change: America's Secret Cold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② Keren Yarhi-Milo, "Tying Hands Behind Closed Doors: The Logic and Practice of Secret Reassurance," *Security Studies*, Vol. 22, No. 3, 2013, pp. 405-435.

③ 杨原:《大国政治的喜剧:两极体系下超级大国彼此结盟之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2期,第38—68页;尹继武、李宏洲:《观众奖赏、损失框定与关系解冻的起源——尼克松对华关系缓和的动力机制及其战略管控启示》,载《当代亚太》,2020年第4期,第34—64页。

足够强大,这让崛起国无法颠覆国际现状和谋求霸权。^①同时,跨国公司的广泛活动促进了高端军备在发达国家之间的生产分工,这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发达国家间的和平。^②最后,核战争的风险(即任何大国冲突都可能升级为核战争)促进了大国之间进行危机管控的动机。^③

毫无疑问,20世纪后半期日益发展的经济与安全依存关系极大促进了国际体系的总体和平。这意味着崛起国不再能够通过战争方式重塑国际秩序,守成国难以通过战争剥夺崛起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源(包括领土、工业中心和原料)。然而,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进行霸权竞争的风险依然存在。这种竞争方式可能涵盖从外交摩擦和危机博弈升级至低烈度的暴力冲突和代理人战争等冲突方式,而它们都会对区域乃至全球秩序造成巨大破坏。同样危险的情形是,一个充满危机博弈的世界可能会让大国习惯于处理危机和低估战争风险,自负的心态可能增加战争的可能性。^④因此,研究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博弈不应局限于探讨霸权战争发生的概率,而是应着重于考虑霸权竞争的起因,尤其是崛起国对现状不满的来源和守成国打压崛起国的诱因。在这一问题上,经济和安全依存并不是促成崛起国与守成国合作的充分条件。恰恰相反,不对称的经济依存关系可以便于一国对另一国施加政治压力,甚至对该国的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此外,对经济依存衰落的预期会让一国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来建立相对封闭的势力范围,而这一尝试极易引起大国冲突。^⑤同理,核战争的风险尽管可以遏制大国间的直接军事冲突,但是无法避免双方通过盟友进行代理人战争或低烈度

① Michael Mousseau, "The End of War: How a Robust Marketplace and Liberal Hegemony are Leading to Perpetual World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4, No. 1, 2019, pp. 160-196.

② Stephen G. Brooks, *Producing Security: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Globa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Calculus of Conflic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③ Robert Jervis, *Meaning of the Nuclear Revolution*.

④ Ja Ian Chong and Todd H. Hall, "One Thing Leads to Another: Making Sense of East Asia's Repeated Tensions," *Asian Security*, Vol. 13, No. 1, 2017, pp. 20-40.

⑤ Dale C.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的“灰色地带”冲突。^①这些冲突行为会极大提升冲突升级的风险。由此可见,经济与安全的相互依存不能保障大国间不会发生霸权竞争甚至暴力冲突,研究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矛盾的发生和升级的原因同样重要。

(四) 国际制度

最后,国际制度的作用正在得到当今学者的重视。这一理论视角既得益于美国霸权秩序为国际制度的产生和延续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实力基础,也与当前新兴大国在国际制度中的特殊作用息息相关。国际制度学派认为,制度有助于降低合作成本,提升国家行为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并且通过重复互动让国家更加在乎信誉。^②国际制度还为接纳新兴大国的诉求提供了特殊的路径。美国政治学者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认为,制度一旦创立并为其参与者提供了合作机会之后,参与者即便在实力对比上发生了变化,也会持续依赖该制度进行合作;毕竟,推翻制度的成本会远高于合作取得的收益。^③此外,国际制度不仅提供了信息交流的媒介,还为新兴大国创造了一套可供模仿的行为规范,参与到国际制度的“社会”环境中的外交官员会更加愿意遵循“和平崛起”的路径以及对国际现状抱有好感。^④这一视角还强调了国际制度为接纳崛起国的地位诉求创造了更大的空间。^⑤简言之,制度学派认为,国际制度可以缓和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有效管理冲突。

然而,制度学派并没有充分解释制度本身的来源,尤其是在权力转移阶

① 徐若杰:《“灰色地带”与成本强加战略:美国在南海对华遏制战略探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0年第6期,第1—27页。

②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Robert Axelrod,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③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④ Alastair Iain Johnston, *Social States*.

⑤ T. V. Paul and Mahesh Shankar, “Status Accommodation through Institutional Means: India’s Rise and the Global Order,” in T. V. Paul,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eds.,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65-191.

段制度权威的式微。如果说守成国在大战之后有足够的动机来建立制度让其权威得以存续,那么崛起国会试图修改制度规则,或是创造新的制度来更好地服务其自身利益。守成国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还不得而知。^①此外,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守成国可以持之以恒地维护国际制度的权威。特朗普政府的“退群”行为已经揭示出,对守成国而言,国内政治变化以及领导人的个人偏好也会充分影响其对国际制度的支持力度。^②制度学派的视角在解释崛起国与守成国关系上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由于制度的权威性会因守成国的政策和实力变化而发生变化,那么制度或许不能对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博弈施加独立影响,甚至制度本身也会成为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竞争工具。因此,学者们应当更多地聚焦于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微观互动。即便这种互动发生在一个制度化的环境中,我们也应当关注双方之间的信号传递和认知过程,而非制度环境本身对崛起国的影响。

现有理论的假说和局限性如表 1 所示。

表 1 现有理论的假说和局限性

	实力对比变化	国内政体差异	经济与安全依存	国际制度
理论假说	实力对比的变化导致崛起国与守成国的矛盾	民主国家之间的矛盾容易得到缓和,而民主国家同非民主国家之间的矛盾容易激化	经济与安全依存为国家之间创造了更多共同利益和脆弱性,因而大国将格外在意战争的风险	国际制度有助于促进大国合作和吸纳新兴大国的崛起
局限性	无法解释崛起国同守成国的合作案例,以及矛盾激化的方式和时机	无法解释不同政体国家之间管控矛盾的措施,忽略了民主国家自身的利益权衡	无法充分解释霸权竞争的起源	无法充分解释守成国对国际制度的支持度的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① 关于这一探讨,见 Alexander Cooley and Daniel Nexon, *Exit from Hegemony: The Unraveling of the American Global Or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② 温尧:《退出的政治:美国制度收缩的逻辑》,载《当代亚太》,2019年第1期,第4—37页。

二、地位承认为何重要？

地位是守成国在现存秩序中影响力的重要标志。国际地位指的是，国际社会内部形成的有关一国在重要属性(包括军事力量、外交影响、科技能力、经济实力、人口规模、政治和社会组织以及文化软实力)上排位共同认知。^①在国家间的日常互动中，一国的地位表现在参与具有排他性的国际集团、对国际重大事务拥有决策权，以及在国际场合享有更多话语权。^②简言之，国际地位就是一国在国际“声望等级”(hierarchy of prestige)上的位次。^③一国需要通过展示积极的形象来促进声望，久而久之便可以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④国家追求地位源于人性中对荣耀和来自本团体以及其他团体承认的心理需要。不过，由于地位本身意味着得到地位承认的国家可以在国际体系中获得特殊的权益并在与他国的互动中获得额外的尊重，地位作为一种社会资源也可以让一国获得更多促进其物质利益的机会。高地位国家通常在国际机构和周边区域中享有一定的特权，在国际事务中承担特殊义务，以及在与他国的互动中拥有更多主动权。^⑤譬如，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

① Deborah Welch Larson, T. V. Paul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Status and World Order," p. 7. 需要强调的是，即便是一些能够客观反映物质力量的指标也不等同于地位承认。譬如，虽然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但是并不意味着经济总量本身能够体现中国的大国地位。只有中国经济总量的意义得到了一些国际机构的权威解读，并让中国加入 G20 等特殊团体之后，中国的大国地位才算得到了承认。

②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Palgrave, 2002, pp. 194-196.

③ 关于地位的定义、如何衡量地位以及地位诉求的表现方式依然存在着一一些争议，可参见王梓元：《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与声望：一项研究议程》，载《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3期，第116—139页。

④ 有关声誉的论述，见 Jonathan Mercer,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⑤ Deborah Welch Larson, T. V. Paul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Status and World Order," pp. 18-19;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p. 31-32; Jonathan Renshon, *Fighting for Status: Hierarchy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20, 51-52; Joslyn Barnhart, *The Consequences of Humiliation: Anger and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18.

代表着其在全球等级体系中享有独一无二的声望和体现这一声望的各种特权。同理,崛起国家也希望通过提升地位来巩固自身日益扩大的利益需要(尤其是安全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家可以在多个属性特征上进行比较和提高声望,国际体系中也存在多个等级体系,通常情况下,一国无法一蹴而就成为全球体系中的大国,其只能在个别区域中进行地位伸张的活动。这些活动可以渐进式地促进一国在全球等级体系下的地位,而不同区域内部的大国利益分布也会影响一国得到地位承认的概率和后果。具体说来,在大国利益集中的区域(核心区域)中,一国争取地位承认的努力可能遇到较大阻力,且地位承认(否决)的后果也更为深远。相反,在较少涉及大国利益的区域(边缘区域)中,一国争取地位承认的尝试则会受到其他方面因素(尤其是守成国的主观认知)的干扰,而地位承认(否决)的后果也有所不同。^①

崛起国和守成国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对地位的偏好都会有所加剧。守成国在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会更加依靠地位作为其影响力的保障。^②对崛起国而言,得到地位上的承认可以让该国感知到他国对其崛起的友善态度,并增强其日益扩大的利益诉求的正当性。当崛起国希望其大国地位得到承认的时候,会提出“地位诉求”(status claims),其内容包括“一国对特定国际权益的要求、该国对一些国际责任的声明、该国展现自身优异品质的信号行为”。^③守成国也会意识到承认崛起国地位的举动可能会对其利益产生深远

①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核心”和“边缘”地区的理解与战略研究中的相关概念有所不同。战略研究依据军事力量投射的难度和战略利益的排序来界定“核心—边缘”区域,而本文根据的是国际体系中的利益分布来界定“核心—边缘”区域,其着眼点在于地位承认的结果对大国互动的影响,而非个别大国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关于这一定义的来源,见 Barry Buzan and George Lawson,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History, Moderni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② 蒲晓宇:《霸权的印象管理:地位信号、地位困境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9期,第34—49页。

③ Steven Ward, *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3; 王梓元:《地位政治与中国崛起的地位伸张》,载《外交评论》,2021年第1期,第52页。

影响。因此,承认与否对于守成国来说是重大的战略抉择,守成国在行动之前会对地位承认的后果进行审慎评估和分析。从地位承认的角度审视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互动过程与结果,可以推动研究者们关注大国政治的微观过程和其中的一些偶然因素,并且突出它们的历史意义。

近年来,学者们正日益重视地位、声望等非物质因素,这些因素围绕地位政治的议题促使崛起国对国际现状提出新的诉求,并为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互动增加新的变数。^①在研究地位承认的问题上,我们需要关注两个基本事实。首先,政治领袖需要在地位诉求与物质利益之间做出权衡(下文简称“地位权衡”)。伸张地位诉求的信号行为要求一国承担起高于预期成本的“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②为了节省人力、财力乃至政治资源,该国无法无休止地进行地位伸张。尽管高调的冲突行为或许会让一国发出最为显眼的地位信号,但是这样的行为也会招致国际冲突升级和消耗国力,以致为领导人带来不良的政治后果。^③其次,鉴于地位诉求源于领导人与民众在心理上渴求民族成就得到国际认可,那么崛起国同守成国在外交互动中的符号、姿态等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对于领导人判断彼此长

① 近年来有关地位政治的代表著作包括 Deborah Welch Larson, T. V. Paul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eds.,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Steven Ward, *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 Jonathan Renshon, *Fighting for Status*; Joslyn Barnhart, *The Consequences of Humiliation*;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 *Quest for Status: Chinese and Russian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Xiaoyu Pu, *Rebranding China: Contested Status Signaling in 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Richard Ned Lebow, *A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Richard Ned Lebow, *Why Nations Fight: Past and Future Motives for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Barry O'Neill, *Honor, Symbol, and Wa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② Lilach Gilady, *The Price of Prestige: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

③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et al., “Testing Novel Implications from the Selectorate Theory of War,” *World Politics*, Vol. 56, No. 3, 2004, pp. 363-88.

远意图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①强调上述两个事实便于我们解释守成国接纳崛起国地位诉求的决策逻辑以及后果。

(一) 守成国的地位权衡决定地位承认是否发生

守成国的领导人在本国的地位诉求和安全风险之间做出的权衡将决定其是否愿意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诉求。事实上,任何国家在谋求更高地位或捍卫既定地位的时候都要平衡地位诉求与地位之外的利益之间的关系。尽管地位诉求本身源于人性中追求荣耀和团体认可的心理需要,但是领导人在决策时还会受到荣耀以外的心理因素的影响。理查德·奈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就曾强调,荣耀是与恐惧(fear)、贪婪(greed)和理智(reason)并存的一种心理机制,而不同的动机互动会随着情势的变化而产生不同效果。^②因此,守成国的领导人在决定是否接纳崛起国地位诉求的时候,也需要考虑其决定的后果。具体说来,承认崛起国的地位意味着守成国将在今后让渡出一些外交主动权,甚至放弃其在一些地区或事项上的特权,这意味着在长期内一个新兴大国将会崛起甚至对守成国的战略利益构成更为严峻的挑战。不过,这一决定的收益是,守成国将在短期内更好地协调与崛起国之间的关系,并且帮助崛起国融入国际秩序,并让该秩序更加稳定。特别是,守成国还会考虑崛起国的战略价值。如果崛起国在物质和国内政治方面都有潜能来帮助守成国制衡其他大国,那么守成国会更愿意以地位承认换取崛起国的支持。简言之,无论是崛起国还是守成国,都要在短期和长期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守成国可以运用地位承认的手段诱使崛起国同它保持合作关系并支持国际现状。^③特别是,在多个大国并存的国际体系(多极体系)中,大国之间存在较为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因此,守成国可能会更加积

① William Ziyuan Wang, "Destined for Misperception? Status Dilemma and the Early Origin of US-China Antagonism,"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24, No. 1, 2019, pp. 49-65.

② Richard Ned Lebow, *Cul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③ 关于崛起国与守成国在时间维度上的博弈,见 David M. Edelstein, *Over the Horizon: Time, Uncertainty,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极地运用地位承认这一政策工具联合崛起国来制衡其他大国。不过,即便在两个大国并存的体系(两极体系)中,一个超级大国依然可以通过承认或提升区域大国的地位来支持其政策。譬如,美国在冷战期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国地位,这一方略实际上服务于美国制衡苏联和解决越南问题的冷战政策。

相反,如果守成国忽略或否定崛起国的地位诉求,那么其代价将是加剧崛起国对现状的不满,并刺激其挑战守成国在局部地区或事项上的利益。在两种情况下守成国会否决崛起国的地位诉求。首先,守成国与崛起国博弈中涉及的利益格外重大,以至于无法让守成国接纳崛起国的地位诉求。毕竟,获得地位承认以后,崛起国在之后染指的利益会更具正当性,这种情形会让崛起国更容易挑战守成国。衰落中的守成国会格外在乎其地位,因为地位可以帮助其维持国际影响力,从而为其恢复实力赢得时间。在此情况下,该国可能更愿意在短期内承受一定的物质损失或甘愿承担与崛起国冲突升级的风险。其次,地位诉求的信号本身还带有模糊性,因此可能造成守成国对崛起国地位诉求的错误认知。譬如,守成国可能将崛起国的地位诉求解读成试图就具体的利益问题进行协商的信号,而忽略崛起国实际上想要投射大国形象的目标。^①

(二) 地位承认(否决)的发生区域和后果

地位承认(否决)所发生的区域将对国际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一般来说,崛起国在获得地位承认以后会更加积极地支持国际现状,但是这并不能保证其之后不会试图扩大军事力量,谋求更大的势力范围,或在国际制度中寻求更多特权。因此,本文还强调地位承认(否决)所发生的区域。若地位承认发生在大国利益集中的区域(核心区域),那么地位承认将改变国际格局的面貌。不过,由于该区域涉及其他大国的重要利益,得到了承认的崛起国也将面临其他大国的制约。诚然,该国是否甘愿挑战现状甚至试图颠覆国际秩序将取决于领导人的特质及其塑造出来的崛起国的后续政策,不过,除了拿破仑和希特勒等具有极端意识形态和风险偏好的领导人外,一般情

^① William Ziyuan Wang, "Destined for Misperception?"

况下的领导人在得到地位承认后会乐于接受现状。在核心区域内发生的地位承认既改变了大国的利益格局,又使崛起国面临其他大国的制约,因此,崛起国会倾向于安守新的国际格局,而不是冒更大风险来谋求新的利益。与之相比,在大国利益并不集中的区域(边缘区域)获得地位承认之后,崛起国可能具有更大的动力来修正现状。即便如此,崛起国在获得地位承认之后试图修正国际秩序的努力将是渐进和谨慎的。19世纪末,美国在西半球得到英国的地位承认以后寻求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影响力,但是其之后的政策致力于同其他大国维持良好关系。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得到地位承认的崛起国统治精英会对现存的国际秩序产生亲近感,部分国内的利益集团也可以在国际交往中获利,这样一来,该国统治精英维持国际现状的动机会强于削弱国际秩序的动机,且在国内遇到较小的阻力。

相反,如果崛起国的地位诉求遭到误解或者否定,且该事件发生在核心区域,则该国会更加敌对甚至会挑起国际争端来进一步表达地位诉求。这其中包含双重动机。首先,由于在核心区域内进行的挑衅政策会直接接触及其他大国的利益,该策略可以让崛起国更加鲜明地突出自身的赶超决心和实力。^①其次,崛起国对国际现状的疑虑加深,其统治精英和部分民族主义团体可能怀疑该国遭遇了国际社会的“玻璃天花板”,由此产生的心理落差会促使该国采取更为激进的手段伸张地位,并在地缘政治上寻求更大范围的安全。^②当地位否决发生在大国利益集中的核心区域时,该国的挑衅政策更易刺激到其他国家。这样一来,他国会揣测其恶意,而这种心理又会加剧安全困境等地位之外的矛盾。^③当崛起国在边缘区域遭受地位否决之后,该国无疑会对国际现状产生强烈不满,但是由于该国伸张地位的领域并不直接挑战其他大国的利益,该国仍享有较大的空间伸张地位。即便如此,地位否决的经历将对该国的领导人和政治精英产生较为持久的心理影响,加剧他们对于守成国的不信任,并且增加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外交摩擦。

① Joslyn Barnhart, *Consequences of Humiliation*, pp. 40-43; Jonathan Renshon, *Fighting for Status*, pp. 24, 65-66.

② Steven Ward, *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

③ Deborah Welch Larson, *Anatomy of Mistrust: U. S. -Soviet Rel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9-21.

不可否认的是,崛起国可能在一段时期内进行多次地位伸张的行动,而守成国也可能根据这些行动而对崛起国的意图和实力形成不同的认知。但是,地位承认本身毕竟是带有重大仪式性质的事件。当守成国做出有关地位承认(否决)决策的时候,其决策者已然对崛起国形成了相对稳固的意见,而崛起国此后的地位伸张行为只能对这些意见施加十分有限的影响。本文想要强调的是,标志着地位承认(否决)的事件可能成为崛起国与守成国关系的重要分水岭。尽管大国关系在之后依然可能经历若干起伏,但是发生在之前的地位承认(否决)依然将对其产生深远影响。

三、理论假说和案例选取

本文的理论分析聚焦于地位承认的发生过程及其后果,其中突出了两个因素。首先,地位承认是否发生?其次,地位承认的后果取决于承认(否决)是否发生在守成国利益集中的区域(核心区域)?在地位承认的问题上,守成国会担心崛起国在确立其大国地位以后将地位作为进一步侵蚀守成国利益的战略资产。即便在地位承认不涉及守成国核心利益的情况下,地位承认失败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其原因是地位信号本身带有模糊性,不容易被识别。无论何种原因,地位承认(否决)一旦发生,其对国际体系产生的后果将取决于地位承认(否决)发生的地缘政治区域。国际地缘政治的核心区域内发生的地位承认(否决)将直接冲击大国间的整体关系。相对边缘的地缘政治区域内发生的地位承认(否决)对崛起国和守成国的直接冲击较小,但是可能对它们之间的互动产生较为持久而又微妙的效果。根据地位承认(否决)对崛起国与守成国之后的互动模式产生的不同效果,我们将地位承认的后果分为四类:和平的秩序变迁、维持现状、霸权竞争、战略互疑加深和外交摩擦增多。上述因果机制如图1所示。

假说一:在国际地缘政治的核心区域内,守成国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诉求,会促成国际秩序的和平变迁。

这一假说做出了与现实主义理论相左的预测。现实主义认为,随着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守成国打压崛起国的动机会增强,因此守成国也难以主动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诉求,尤其是在大国利益集中的地缘政治区域。上述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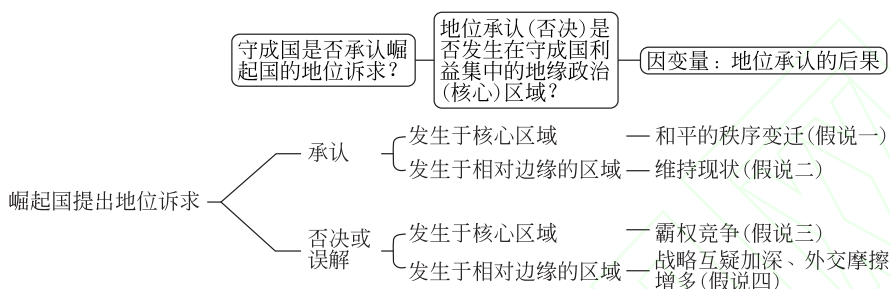


图 1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说的价值就在于解释一些反常现象。譬如,为什么普鲁士在统一德国之后迅速获得了地位承认?解答类似的实证困惑有助于我们发现那些促进国际秩序和平变迁的机制。

假说二:在相对边缘的地缘政治区域内,守成国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诉求,可以让崛起国更加支持现存秩序。

这一假说强调,地位承认可以作为守成国影响崛起国的政策工具。与强调政体类型差异的理论有所不同的是,守成国即便和崛起国的政体类似,也可能将其视作威胁。然而,守成国可能试图通过承认崛起国的大国地位达到安抚的目的,这一做法并非出自守成国对崛起国的信任,而是出于地缘政治利益上的算计。

假说三:在国际地缘政治的核心区域内,守成国无视崛起国的地位诉求,会导致霸权竞争。

这一假说突出了地位否决的后果。即便是崛起国通过渐进的方式试图修正国际现状,其诉求依然可能遭到否决。而即便在崛起国的物质利益没有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这一否决结果依然可能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强化崛起国推翻现状的决心和守成国打压崛起国的意志。

假说四:在相对边缘的地缘政治区域内,守成国无视崛起国的地位诉求,会刺激崛起国对国际现状的不满,并导致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互疑加深和外交摩擦增多。

这一假说意在强调地位信号本身的模糊性。由于崛起国的领导人总要借助于一个具体的议题而提出包含着地位诉求的主张,守成国可能难以区

分该领导人对议题本身的兴趣和其中隐含的地位诉求,因此容易引起误解和外交摩擦。崛起国与守成国在边缘地区的博弈牵涉较少的物质利益,因此,由于地位信号的模糊性而导致的错误认知更加能够解释双方协商的失败。

本文选取了四个案例:俾斯麦领导的德国统一、1896 年英美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的和解、英德霸权竞争的开端以及 19 世纪末英德在远东地区的外交博弈(见表 2)。这些案例均反映了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政治博弈,而且在自变量、中间变量和因变量上分别对应了上述四种假说。本文中案例研究的目的是要提供关键证据来反映作用于自变量、中间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因果机制。尤为重要的是,这些证据既要突出既有理论无法解释的历史细节,还要说明这些细节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推动作用。^①因此,每一个案例都需要突出若干其他理论无法合理解释的历史过程。

表 2 本文案例

	发生在核心的地缘政治区域	发生在相对边缘的地缘政治区域
地位承认	普鲁士统一(1870—1871 年)	英美委内瑞拉问题(1896 年)
地位否决	摩洛哥危机(1905—1906 年)	英德在远东的结盟谈判(1898—1900 年)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另外,本文选取的案例都属于对于权力转移具有长远影响的短期事件,这一视角有助于控制国际体系、国际规范和国内政体的差异等宏观层面的变量。换言之,宏观层面的变量(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层次上)在短期内都相对稳定,因此它们对短期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只能施加极为薄弱和间接的影响。相比之下,地位承认(否决)对那些重大事件的发生能够发挥较为直接的推动作用,因而它们对守成国与崛起国关系的影响可以更好地得到验证。本文选取的案例均发生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的多极体系中。在这期间,守成国回应崛起国地位诉求的方式存在显著差异性。这充分说明尽管多极体系内守成国在彼此间的竞争压力下可能更加愿意拉拢崛起

^① Stephen Van Evera, *Guide to Methods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1-32.

国,但是地位承认的过程依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最后,本文选取的案例聚焦于因地位承认问题而产生的一轮(而非多轮)博弈。其目的在于突出守成国承认(否决)崛起国地位诉求的动机及其后果。这并不排除崛起国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提出多个地位诉求,且频繁进行地位伸张的活动。但是,一旦守成国做出了地位承认(否决)的举措,该举措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最后,本文的案例选取排除了具有极端意识形态和风险偏好的领导人(譬如拿破仑和希特勒)。正如前文所述,极端的意识形态和风险偏好会扭曲地位承认的效果。鉴于本文选取的领导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①,这样有利于考察地位承认(否决)对国际关系的一般影响。

四、假说一:德国统一与地位承认

1870年普法战争的结果标志着欧洲霸权秩序的更迭。在普鲁士的领导和南德意志各州的支持下,统一不久的北德意志邦联在色当战役中力挫法军,甚至俘虏了法国君主拿破仑三世。这一结果直接导致法兰西帝国终结。南德意志各邦随后加入邦联,德意志帝国于1871年1月18日宣告正式成立。^②英国政治家本杰明·德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将德国统一视作“比法国大革命更加重大的政治事件”,他还强调,英国“面临着一个新的世界和一种新的影响力量……均势已经完全被破坏”。^③

然而,令现实主义理论困惑的是,即便均势被破坏,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列强未曾倾力干预普鲁士的统一进程。诚然,现实主义理论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将这一结果归结于大国倾向于规避责任并试图让他国担负军事动员的成本和战争风险,以及英俄两国利用德国制衡法

① 或许俾斯麦在精明和审慎的个性方面有别于一般的领导人,但是这种行事风格在实践中让俾斯麦比其他领导人更加轻视国际地位而更重视物质利益。由此推断,地位承认对俾斯麦政策的影响理应较弱。然而,如果实证案例揭示出了地位承认对俾斯麦的影响,这一发现会增强假说的说服力。

② Gordon A. Craig, *Germany, 1866—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27-34.

③ 转引自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11页。

国的需要^①,不过,这一解释仅可以让我们理解普法战争之前英俄对俾斯麦的态度。当德国取代法国成为欧洲大陆上新的霸权国的时候,作为拿破仑战争之后的联合霸主,英俄两国不仅在普法战争的过程中袖手旁观,甚至主动承认了普鲁士取代法国作为欧陆霸主的国际地位。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包括 1871 年初召开的伦敦会议和 1873 年正式成立的“三皇联盟”(League of Three Emperors)。普鲁士—德意志帝国不仅以大国身份参与了两场会议,而且俾斯麦在调停欧洲事务上的主张也通过两场会议得到了贯彻。这显示出,刚完成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大国地位诉求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正式接纳。

如果英俄两国的目的仅是维持欧洲的均势格局,在法国战败之后他们就应当更加积极地遏制德国,至少不应当积极地帮助德国将军事胜利转化为与其实力及体量相匹配的大国地位。在法军战败后,如何承认德国的大国地位的确变得格外棘手。事实上,新当选的法国临时政府总统阿多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已经开始积极游说欧洲各国,试图提醒他们重视统一后的德国在实力和利益上对欧洲稳定的威胁。^②正如德斯累里暗示的,统一后的德国将打破维也纳会议以后的均势格局,并且彻底改变三十年战争以来中欧分裂的局面。这一改变对英俄两国而言都意味着日后国际格局会更加复杂,而且一个持续发展壮大的德国将更有潜力挑战他们的既得利益。然而,英俄两国依然选择承认德国的大国地位。

究其原因,地位承认为英俄两国提供了一个拉拢德国成为其战略伙伴的手段。拿破仑战争之后,俄国作为欧洲大陆的潜在霸主对作为海洋霸主的英国构成了长期的威胁。英国需要保证地中海地区的均势格局,即避免任何一个大国威胁其在近东的势力范围,尤其是防范其他欧洲列强威胁奥斯曼帝国的稳定和阻断波斯普鲁斯海峡的通航自由。^③与英国相比,俄国人更加关注短期利益。面对身在法国的波兰流亡政治领袖的挑衅,他们在意的是保留对波兰属地的控制权。此外,承认德国的地位还有利于让俄国腾

^①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pp. 289-293.

^② 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212.

^③ Dale C.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pp. 331-337.

出手来处理同奥地利的关系。^①不过,尽管俄国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承认德国的大国地位,他们依然希望得到外交权益上的补偿。于是,俄国借口对“黑海中立化”问题不满,要求大国承认其在黑海自由航行军舰的特权,这实际上是要为俄国继续干涉奥斯曼土耳其的事务创造条件。不出所料,这一行动触怒了英国,英国政府要求以德国取代法国的欧陆霸权国地位为条件来换取德国在土耳其(近东)问题上支持英国的立场。^②俾斯麦采取了不选边站的策略,从而得到了英俄双方的支持。在1871年1月至3月召开的伦敦会议上,俄国做出了妥协,同意不再以单边行动改变黑海现状。同时,为了拉拢德国,英俄两国都支持了德国对战败的法国提出的苛刻投降条件(尤其是赔款和割让阿尔萨斯—洛林地区)。^③因此,这场会议实际上成了刚完成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得到地位承认的外交仪式。俾斯麦不仅获得了让法国临时政府尽快接受投降条件的筹码,还获得了与大国地位相一致的形象和特权。

德国地处中欧平原,同包括法、俄在内的诸多欧陆国家接壤,在德国的大国地位得到承认以后,德国领导人深感其利益已和国际格局的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1873年德皇与沙俄、奥匈一道创立“三皇联盟”,巩固了德国在欧洲大国政治中的地位。这一同盟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它让整个欧洲的政治家都看到了德国在调停俄、奥在巴尔干矛盾上的角色,而这一外交影响很快又让德国处于调停英俄矛盾的有利位置。^④诚然,俾斯麦也担心召开国际会议会暴露他与俄奥两国的分歧,因而并不情愿通过召开国际会议的方式解决列强争端。^⑤这说明,得到大国地位的承认并不是俾斯麦的优先目标。在德国统一之后,既然俾斯麦本人并未把伸张大国地位作为其政策的出发点,那么地位承认首先要归因于英俄对德国的地缘政治需要。

不过,得到大国地位承认后的德国的确在外交上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

① A. J. P. Taylor,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p. 214.

② A. J. P. Taylor,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pp. 215-216.

③ Ibid., p. 216.

④ Gordon A. Craig, *Germany*, pp. 103-104; A. J. P. Taylor,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pp. 218-221.

⑤ 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32—33页。

因而俾斯麦才得以施展其外交才能。通过“三皇联盟”，俾斯麦不仅避免了欧洲爆发牵涉德国的大国冲突，还成功地在外交上孤立了法国。^① 1878 年召开的柏林会议又一次让德国处在欧洲外交舞台的中心位置。此后，德国甚至在调解列强之间贸易、海外殖民地等事务上也开始发挥主导作用。1884—1885 年柏林召开了西非会议(the Berlin West Africa Conference)。^② 这些仪式性的场合不断确认德国在欧洲大国中的影响力，也让以俾斯麦为首的一代德国政治领袖更愿意扮演维护国际秩序和调停大国冲突的角色。

一言以蔽之，德国统一后顺利得到大国承认，推动了欧洲大陆上和平的霸权交替，这一结果不仅得益于俾斯麦高超的外交技巧，归根结底，其终究离不开英俄两国基于自身利益而做出的决定。现实主义理论无法充分解释英俄做出这一决定的动机，原因在于现实主义理论对物质利益的重视，导致其没有足够重视地位承认作为调和大国关系的手段。

五、假说二：英美的权力转移与委内瑞拉问题的和解

19 世纪末英美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的和解是大国间实现和平权力转移的经典范例。学者们尤其将这一结果归功于英美之间的文化趋同、民主国家之间共享的价值规范，以及民主制度为国家合作提供的信任机制。^③ 这些因素对英国承认美国在西半球的大国地位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只有在经过英国对美国区域霸权影响力的公开认可之后，英美矛盾才得到解决，因此地位承认本身的价值不容低估。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都实现了工业化，英国面临着美国在综合国力上的全面赶超。早在 1890 年，美国的钢铁产量就超越了英国，跃居世界第一。这为华盛顿的政治精英伸张积蓄已久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提供了更

① 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商务印书馆 2021 年版，第 33—36 页。

②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 194.

③ John M. Owen, “How Liberalism Produces Democratic Peace”; Daniel M. Kliman, *Fateful Transitions*.

加坚实的实力基础。^①委内瑞拉问题为美国在西半球伸张霸权地位提供了契机。委内瑞拉问题源于该国同英属圭亚那之间的边界争端。委内瑞拉政府不满于英国官方勘定的边界,并于1887年同英国断交。之后,委内瑞拉援引“门罗主义”向美国求援。起初,“门罗主义”是服务于美国支持南美殖民地脱离西班牙统治的一套政治说辞,随着西班牙统治的衰退,“门罗主义”成为美国捍卫自身在西半球势力范围的正式的地位诉求。^②1895年7月,美国国务卿理查德·奥内(Richard Olney)指示美国驻英使馆向英国政府正式阐明美国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的立场。在这里,奥内援引了“门罗主义”,并强调美国已是美洲大陆的“主宰者”(sovereign),且具有采取单方面行动的权利。^③奥内的这一举动实际上是借委内瑞拉问题要求英国公开承认美国对西半球事务的优先裁量权,而这一特权体现了美国的大国地位。随后,总统格罗夫·克利夫兰(Grove Cleveland)也向国会表达了美国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的强硬立场。^④

英国对待委内瑞拉问题的立场体现了索尔兹伯里政府对美国在西半球建立霸权影响力的态度。起初,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爵士(Lord Salisbury)愿意展开谈判,但是他并不情愿放弃英国在委内瑞拉的利益。不过,随着英国在世界的其他地区面临新的紧张关系,委内瑞拉问题在英国的政策议程上开始被边缘化。^⑤就在委内瑞拉事件期间,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鲁莽地向英国势力范围下的德士兰瓦共和国(Transvaal)总统克鲁格(Kruger)发出了贺电,赞扬其抗击南非的英国公司的行动(史称“克鲁格电报事件”)。这一事件迅速点燃了英国民意,让索尔兹伯里政府不得不重视德国对其海

① Paul Kennedy,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pp. 200, 246.

② Stacie E. Goddard, *When Right Makes Might: Rising Powers and World Order*,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68-69.

③ David M. Edelstein, *Over the Horizon*, p. 76;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Washington, D. C., 1895 (1), pp. 552-562.

④ *FRUS*, 1895, (1), pp. 542-545.

⑤ Paul Kennedy, *The Realities Behind Diplomacy: Background Influences on British External Policy, 1865—1980* (London: Fontana Press, 1981), pp. 108-109.

外利益的挑战,以及英德之间已经存在的贸易摩擦。^①英国军方甚至还组织了舰队,准备随时派遣到世界各地,伸张英国的国际影响。^②

事实上,英国还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战略问题。1894年结成的法俄同盟让英国朝野都开始担忧之前预设的“双强标准”(Two-Power Standard),即英国海军力量需要强于世界第二和第三大海军力量的总和。“双强标准”起初是一项海军扩建法案,于1889年3月递交议会审议,而后在舆论的要求下英国议会又追加了扩军预算。^③即便如此,早在1892年3月,海军就提供了预估报告,认为鉴于法俄之间的军事合作,英国在保障地中海和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事项上已经捉襟见肘。1893年年底,保守派领袖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在议会中就公开质疑“双强标准”的可靠性。^④1895年春天,德法俄三国在甲午战后联合逼迫日本向清政府归还辽东半岛的事件,让英国的战略家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三强联合的危机,更不要说在这时日本已在东亚建立起新的海上霸权。^⑤尽管在这一刻,英国政府尚未下定决心扩充海军和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战略收缩,但是英国在远东和中亚同时也面临着来自俄国的压力,相比于这些当务之急,委内瑞拉问题显然不具有迫切性,况且与美国在委内瑞拉发生军事冲突不仅有益于英美自身的经济联系,还会让英国无力应对与其他大国的竞争。正是基于这一认知,英国内阁集体同意了美方的要求。尽管两年之后国际仲裁做出了对英国在委内瑞拉属地上有利的决定^⑥,不过,委内瑞拉事件本身象征着美国在西半球的大国地位得到了正式确认,这让美国在之后同英国的博弈中占据了更大主动。

在一定程度上,委内瑞拉事件体现出国际制度促进英美合作的作用以

① William L. Langer, *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1890—1902*,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Press, 1968, pp. 240-244; 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151—155页。

② A. J. P. Taylor,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pp. 365-366.

③ 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London: Penguin Books, 2017, pp. 178-179.

④ Aaron L. Friedberg, *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54-155.

⑤ Aaron L. Friedberg, *Weary Titan*, pp. 156-157.

⑥ David M. Edelstein, *Over the Horizon*, p. 78.

及民主国家之间的互信。不过,在这一案例中,英国对自身利益的权衡也不容忽视。当英国在19世纪末面对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外交和军事挑战的时候,委内瑞拉事件的重要性随之降低了,这也促使英国选择通过承认美国大国地位的方式而削减军事成本和实施战略收缩。鉴于委内瑞拉问题并不牵动欧洲大国的核心利益,对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列强而言,委内瑞拉实属边缘地区。因此,英国在这一区域内承认美国大国地位的阻力较小。衰落中的守成国会让渡于崛起国一些利益,这一点符合一些现实主义者的预期,但是现实主义者终究不能解释地位承认对崛起国与守成国关系的长远影响。^①英国这一举动的长远意义是美国开始谋划成为英国霸权的替代者,不过,这一努力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而且是借助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机遇而完成的。在突发的机遇降临之前,美国更加频繁地扮演起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角色。

六、假说三:摩洛哥危机与英德霸权竞争的开端

1904—1906年发生的两件国际大事深刻改变了一战前欧洲的政治格局,分别是(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和日俄战争。在北非,德国认为英法在摩洛哥事务上的协商挑战了其大国地位,从而挑起争端并施压欧洲列强接纳其地位诉求。与此同时,日本在远东对俄国战争的大胜打消了英国对俄国威胁的顾虑,英国可以将注意力完全对准日益崛起的德国。德国在摩洛哥危机中咄咄逼人的表现刺激了英国对其野心的顾虑。此外,在摩洛哥危机之后举行的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会议上,德国的要求被公开否决,这一结果让德国蒙羞,以致德皇更加怀疑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对德国崛起的敌意。德皇的情绪又促进了已经进行中的英德海军竞赛,其结果是地位诉求不再局限于地位政治中的博弈,而是造成了更广泛的英德霸权竞争。这一竞争最终成为一战爆发的主因。

^① 事实上,吉尔平认为,尽管守成国能够对崛起国做出部分让步,但是该让步只会鼓励崛起国进一步损害守成国利益并在之后加剧双方的矛盾。与这一预测相反的是,地位承认的理论认为崛起国如果能够在国际体系中的边缘地区获得大国地位,该国将在较长时期内满足于现状甚至同守成国建立起一定程度上的战略互信。

摩洛哥危机的起因是,1904年4月,英法两国在殖民地瓜分(尤其是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摩洛哥问题)上达成了广泛协议,而推动这一进程的正是法国政坛上反对德国的核心人物、外交部长泰奥菲勒·德尔卡斯(Theophile Delcasse)。因此,在德国看来,这一协定带有鲜明的反德立场。不仅如此,德国认为,鉴于自身在摩洛哥地区存在一定的商业利益,英法在商定殖民地问题的时候也应当让德国参与谈判。^①因而,德皇的高级外交幕僚弗雷德里希·冯·霍尔斯特(Friedrich von Holstein)表示:“德国反对法国对摩洛哥的吞并不仅是因为经济原因,更重要的是维持其声望。”^②于是,德国首相伯纳德·比洛(Bernhard von Bulow)说服德皇威廉二世于1905年3月31日访问了摩洛哥北部、位于直布罗陀海峡的丹吉尔港(Tangier),在比洛和霍尔斯特精心策划下,德皇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并强调了德国在摩洛哥的经济利益。由于不满于幕僚们为其准备的谨慎措辞,德皇的演说更加突出了德国作为大国对摩洛哥的主权独立负有义务,这让霍尔斯特愤怒不已。^③从职业外交家的视角看,德皇已经开始过度追求地位承认并忽略了同英国交恶的风险。

各国对德皇讲话的反应不一。俄国在摩洛哥既无经济利益也无战略利益,同时又陷入了同日本在远东的战争,因此沙皇急于同德国达成外交一致,避免被卷入欧洲的冲突中。1905年7月24日,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与德皇威廉二世在比约克岛(Bjorko)附近的军舰上秘密达成了一项防御性同盟条约,这样一来,德国成功地在外交上孤立了法国。^④在法国方面,摩洛哥问题在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以总理莫里斯·鲁维尔(Maurice Rouvier)为代表的务实派反对德尔卡斯对德国的强硬立场。鲁维尔认为,在没有俄国支持的情况下,法国无法与德国对抗,最好的选择只有同德国缓和,为此,他甚至不惜以德尔卡斯辞职作为缓和的条件。德国在这一刻更显

① Steven Ward, *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 p. 83; Paul Kennedy, *The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1860—1914*, New York: Humanity Books, 1980, p. 275; 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215、217、218页。

② A. J. P. Taylor,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p. 421.

③ Jonathan Mercer, *Reputation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78.

④ A. J. P. Taylor,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p. 432.

强硬,从而成功地逼迫德尔卡斯辞职。^①至此,德国几乎达到了所有的目标:伸张自己的大国地位,击溃以德尔卡斯为首的法国反德势力,以及离间欧洲各大国之间的关系。

然而,德国却不满足于此,而是急于在短时间内让各国公开承认其地位。就在德尔卡斯辞职不久,比洛就向法国要求以国际会议的方式为摩洛哥危机找到解决方案。^②这一倡议无异于公开羞辱法国,其实质是让各国以外交仪式的方式将德国认定为新的欧洲霸权国,这无疑增加了各国的恐惧。摩洛哥本身涉及英法两国在地中海和北非地区的势力范围,尤其是影响到两国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而且还影响到直布罗陀海峡的通航自由。事态的走向骤然牵动了英国的神经。英国为了避免外交上的孤立,不得不加强同法国的联系。英国外相兰斯多恩爵士(Lord Lansdowne)强调,英法需要对于任何突发事件保持沟通,这实际上仅是为了确保法国不得在不知会英国的情况下同德国媾和。^③

结果,德国要求召开国际会议的做法迫使英俄两国明确自身对法国的义务。^④随着日俄战争的结果日益明朗,日本在远东的军事优势已经无可置疑,英国又成功地将英日同盟的安全义务延伸至印度,这样俄国对英国的威胁几乎可以消除。于是,俄国只得更加依赖法国在经济和安全上的支持。鉴于法国的反对,俄国又只得撤销了先前与德国的条约。^⑤这些变数让1906年初召开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充满不确定性。果然,经过六个星期的僵局,各国一致投票支持法国的立场,只有在摩洛哥问题上没有任何利益的奥匈帝国站在了德国一边。德国的地位诉求被彻底否决,之前积累起的声誉也烟消云散。

很显然,英国作为守成大国的领袖,拒绝承认德国的地位诉求。1905年

① Jonathan Mercer, *Reput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79; Taylor,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p. 430.

② Jonathan Mercer, *Reput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82.

③ A. J. P. Taylor,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p. 431.

④ Ibid., pp. 429-430.

⑤ A. J. P. Taylor,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p. 434; 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223页。

底出任外交大臣的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格外注重英国的国际声誉和霸权地位。他并不惯于从均势的角度思考问题。事实上,他的主要顾虑是,自由党需要继续保持被其取代的保守党的外交立场,以免受到国内的批评;同时,格雷认为,保持同法国的合作“既基于利益也基于荣誉”。^①早在1906年1月,格雷就向德国发出了严正警告,强调英国不会在法德战争中置身事外。^②为此,他还批准了英国同法国的军事对话机制。最初,这一机制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其目的并不是组建对抗德国的同盟,而是向德国表达英国反对其在摩洛哥行为的决心。^③其动机正如格雷在一份备忘录中写到的,如果英国让法国处于险境,那么“美国将鄙视我们,俄国将不会认为和我们在亚洲达成友好协定是值得的,日本将重新寻找结盟对象,我们将没有朋友并失去得到朋友的能力,……而德国将充分利用这一局势使我们处于不利局面”^④。

简言之,德国希望通过摩洛哥问题要求各个大国承认其地位,英国则更加在意地位承认的后果。在摩洛哥危机之前,英国就已经开始对德国的长远意图抱有疑虑。早在1904年,英国就已经更新和扩建本土舰队,并撤销大量驻防海外的超期服役和小型舰船。^⑤同样不容忽视的是英国领导人的主观认知,地位焦虑带来的恐惧、愤恨等情绪可以更加准确地解释英国对德国地位诉求的否决。更为重要的是,德国的地位诉求直接刺激了英国对德国长远意图的疑虑。英国外交部1907年呈送英王的备忘录(史称“克劳备忘录”)直接指出,德国在摩洛哥危机中的行为表明了德国试图削弱其邻国并最终建立霸权的野心,该备忘录还将俾斯麦之后的英德关系刻画为一个矛盾不

① A. J. P. Taylor,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pp. 436-437.

② Paul Kennedy,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pp. 233.

③ A. J. P. Taylor,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pp. 437-438.

④ Keith M. Wilson, *The Policy of the Entente: Essays on the Determinants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04—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94-95.

⑤ Paul Kennedy,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pp. 216-217.

断的过程。因而,该备忘录奠定了之后英国对德国的政策基调。^①

在一定程度上,英德的政体差异可能让两国之间缺乏建立互信的有效机制。^②不过,政体差异难以解释双方战略互疑加深的过程。权力对比变化的假说可以部分解释英国对德国的顾虑,但是不能解释德国为何要在摩洛哥问题上向列强发难,也无法解释德国之后的激进政策。德国在摩洛哥地区的经济利益十分有限,但是摩洛哥却涉及英法的核心利益,在这一地区挑战英法对德国而言充满风险。德国的这一行动更加突出的是伸张地位诉求的动机。然而,英国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同法国联手否决德国提议的行动不仅刺激了德国以更加激进的方式伸张自身大国地位,还让德国领导人深感危机的来临。在1906年底,海军大臣阿尔弗雷德·提尔皮兹(Alfred von Tirpitz)已经彻底改变了立场,他起初不愿意在海权上刺激英国,但是此时他决心同英国展开军备竞赛。这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英国发起的“无畏”级巡洋舰竞赛的回应。^③不过,提尔皮兹的观点也很可能带有国内政治的动机,而且,就他自身而言,强调大国地位可以让他对帝国议会和其他领导人的游说工作更具感染力。^④此后,地位诉求越来越多地成了一种政治资产,领导人为了对抗国内的威胁不愿放弃这种资产,在此过程中,他们自身也容易相信争取大国地位是保障德国利益的必不可少的方式。正是为了修正1905年摩洛哥危机上的外交劣势,德国在1911年以更大的决心挑起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其结果是让英德矛盾变得完全不可调和。^⑤

摩洛哥危机反映了国际制度的脆弱。事实上,德国正是以维护摩洛哥

① Paul Kennedy, *Rise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onism*, pp. 402-403; William Mulligan, "From Case to Narrative: The Marquess of Lansdowne, Sir Edward Grey, and the Threat from Germany, 1900—1906,"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30, No. 2, 2008, pp. 273-302.

② Daniel M. Kliman, *Fateful Transitions*, pp. 46-55.

③ 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256—260页。

④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01.

⑤ Steven Ward, *Status and the Challenge of Rising Powers*, pp. 87-90.

主权独立和门户开放原则来伸张自身在摩洛哥的威望的。^①可以说,德国并不是以“修正大国”的形象示人。但是,英国并不认可德国提出的理由。此外,与英国的经济依存并未让德国更加审慎。恰恰相反,当英德关系恶化之后,德国领导人更加担忧英国会利用自身在贸易体系中的优势来遏制德国的经济发展。^②因此,英德霸权竞争的起因源于1905—1906年围绕摩洛哥问题的地位政治博弈。

七、假说四：英德十九世纪末的远东结盟谈判

英德权力对比于19世纪末就开始发生深刻变化,但是英德矛盾并没有立刻爆发。正如上一个案例反映的,直到摩洛哥危机之后英德之间的霸权竞争才开始愈演愈烈。在此之前,英德之间试图合作甚至尝试结盟。事实上,从1898年到1902年,英德围绕在华的势力范围问题进行了三次协商,在此过程中,英国多次提出与德国结盟的建议。然而,这些协商因为彼此对外交意图的误判无果而终。这一错失的结盟机会让英德之间互疑加深,从而为之后两国矛盾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不过,这一阶段的英德关系未曾引起国际关系理论界的关注。学者们因为聚焦于权力转移过程中突显出来的各种国内、国际结构差异,而通常将英德矛盾的产生和恶化看作一个持续的过程。相比之下,地位承认的理论并不认为英德矛盾的升级是实力变化和国内政体差异等结构性条件的必然结果。本文关于地位承认的假说从微观互动的角度着眼,能够发现英德关系在发展中出现的波折甚至合作的机会,该假说还可以解释为何双方错过了合作的机会。

1897年,德国国务大臣比洛(1900年出任首相)在帝国议会上正式提出“世界政策”(Weltpolitik),其公开目的是为德国赢得“阳光下的地盘”。这一宣示意味着,德国作为世界性大国将要更加积极地伸张自身的地位,而这

^① 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219—221页。

^② Dale C. Copeland,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War*, pp. 122-133.

一地位得到体现的方式正是获得海外殖民地和发展海军。同年11月,德国借口两个传教士遇害出兵占领了中国山东的胶州湾。这一行动发出的信号是德国要更加进取地追求海外利益。^①1898年,德国议会通过第一部海军法案。比洛和提尔皮兹都认为,此后德国必须经过一个“危险期”,即在赶超英国海军的同时避免英国的察觉和反制。^②在这期间,德国需要和英国、俄国两个分别在全球范围和欧洲能够威胁其利益的大国同时保持良好关系,并且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来为自身争取可贵的战略机遇期。^③

从德国后来的政策来看,“所谓的‘世界政策’更像是某种表态和宣示,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和目标”^④。获取殖民地和发展海军对于能否促进德国的国民财富和地缘政治安全都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它们事实上更像是象征德国大国地位的符号。不过,英国的政治家始终没有理解德国的地位诉求,也就更不可能考虑以地位承认换取德国对英国外交立场的支持。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一开始就希望利用德国追求海外利益的契机同德国形成同盟。张伯伦早已对首相索尔兹伯里在远东的被动立场不满,他一贯主张英德在种族和宗教上的“天然同盟”关系,在制衡俄国方面,张伯伦又看到了同德国联合的契机。^⑤于是,张伯伦利用私人关系,于1898年3月底至4月底同德国驻英国的外交官员进行了三次会晤。在与德国驻英大使哈兹菲尔德爵士(Paul Count von Hatzfeldt)的一次会晤中,他提议英德一起同俄国彼此承认势力范围,这一提议实际是鼓励德国加入英国向俄国施压。^⑥然而,首相索尔兹伯里随后迅速介入了张伯伦的对德外交中,他对德皇威廉二世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感,在他看来,德皇“古怪的个性”会让他在遭遇谈判困难的时候转

① 事实上,正是提尔皮兹在1896年把中国胶州湾看作理想的海军基地。见 William Langer,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p. 450.

② Gordon A. Craig, *Germany*, p. 309.

③ A. J. P. Taylor,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p. 372.

④ 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192页。

⑤ T. G. Otte, *The China Question: Great Power Rivalry and British Isolation, 1894—190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35-136.

⑥ William L. Langer,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p. 499; Otte, *The China Question*, pp. 147-148.

向“对方阵营”。在这里,索尔兹伯里担心的是,英德谈判的失败会刺激德皇直接与俄国结盟对抗英国。^①

索尔兹伯里在一定程度上对德国存在误判。此时,威廉二世和比洛一贯的立场是,随着英俄矛盾的加剧,德国可以提高自身筹码并让英国满足其更多的条件。由此看来,英国首相依然相信英德之间可以建立互信。张伯伦则认为,只要德国在中国山东或其他海外殖民地的利益得到承认,德国就有足够的理由加入英国共同反对俄国,而这一结盟意愿又因为德国驻英国外交官艾卡德斯坦男爵(Baron Eckardstein)的一厢情愿得到了强化。艾卡德斯坦向张伯伦夸大了德皇对与英国结盟的兴趣,然而他的表述并不符合事实。当张伯伦的外交试探被比洛正式驳回后,他随即向艾卡德斯坦表达了不满情绪。^②

事实上,无论是索尔兹伯里还是张伯伦都忽略了德国的地位诉求,他们看中的只是德国在远东的局部利益。在1900年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中,俄国借机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为了向俄国施压,英国再次拉拢德国,并于同年10月16日签订《英德扬子协定》。这一次德国方面的动机仅是抗议俄国在镇压义和团运动期间的单方面行动,并无心同俄国对抗,因此该协定也没有涉及与俄国划定势力范围的问题,尤其是没有提及英国关切的的中国东北和直隶地区的门户开放。^③这一结果依然没有满足英国的期待,之后上任的外交大臣兰斯多恩决定再次对德国提出结盟倡议。1901年春,德国提出了要求英国必须加入其在欧洲的同盟体系(即德国与奥匈和意大利的同盟)的条件。很显然,英国并不能满足这一条件,德国在欧洲的同盟针对法俄同盟,而英国并不想扩大同它们的矛盾。实际上,德国提出这一条件的目的并不在于达成具体成果,而是希望在奥匈和意大利面前展现其能够与英国讨价还价的形象。换言之,德国的外交条件意在获取声望而不是眼前的利益。德国实际上的立场就是不在英俄之间选边站。英国无法理解这一点,导致

① T. G. Otte, *The China Question*, p. 155.

② William L. Langer,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p. 501.

③ 徐弃郁:《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206页。

英德的结盟谈判又一次夭折。^①

诚然,远东格局在大国政治中相对边缘,这里并不牵涉英德两国的核心利益。不过,屡次外交协商无果增加了英德两国之间的互疑。不久之后,德国又以英国诚意不足为由拒绝了英国在摩洛哥同德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倡议。德国领导人认为,暴露英国在摩洛哥的企图可以制造英法之间的信任危机,同时也让俄国看清英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②事实恰好相反,1902年英国同日本结盟,满足了其在远东制衡俄国实力的需要。1904年英法在摩洛哥问题上达成一致。同时,英国同德国展开海军军备竞赛。德国的世界政策彻底落空。尽管德国领导人一直将英国看作长期的战略竞争对手,但是在与英国的外交磋商之后,德国更加深信英国与法俄同盟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在英国方面,同德国结盟的失败也加强了英国同法国和解的意愿。简言之,英德领导人因在外交协商过程中多次碰壁而透支了互信,这也为摩洛哥危机发生之后的霸权竞争埋下了伏笔。

基于权力对比变化的解释,从崛起国和守成国的矛盾来看,英德矛盾的深化或许并不令人意外,但是,这一视角无法解释为什么英国会愿意拉拢德国。^③同理,政体类型的差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英德双方的合作,但是,就历史证据来看,政体上的差异并未阻碍英德进行外交沟通,英国对德国外交信号的误解并不是因为无法获取有关德国意图的信息。因此,英国在远东问题上向德国提出的结盟倡议和德国对英国的回应方式需要新的理论视角加以解释。本文提出的地位承认视角强调了英德协商中针对特定信号的认知差异,还突出了地位承认对于崛起国与守成国关系的中长期影响。19世纪末,英德在远东地区的结盟谈判体现了英国对德国的地位诉求的误读,以及德国在无法得到地位承认的情况下与英国战略互疑的深化过程。

① A. J. P. Taylor,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p. 396.

② Ibid., p. 397.

③ 诚然,从大战略的视角出发,英国拉拢德国的动机可以得到更好的解释,即英国希望联合德国在远东制衡法俄同盟。但是,该视角无法解释英德在互动过程中的信号释放和相互认知。地位承认的理论不仅强调了崛起国和守成国释放地位信号的政治(或战略)动机,还突出了认知地位信号和承认崛起国地位诉求的难度。在这一方面,地位承认的理论可以解释更多的互动效应,而大战略理论只能解释崛起国或守成国一方的政策制定和执行。

八、结论

本文试图通过地位承认的视角来解释崛起国与守成国的互动过程及结果。地位承认是守成国的重要外交资源:守成国可以通过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诉求来增强其对国际秩序现状的支持度。然而,地位承认也可以让崛起国在之后获得更多外交上的主动权。崛起国提出地位诉求,以及守成国承认或否决(或误解)崛起国的地位诉求,构成了权力转移中的地位政治博弈。这一过程既涉及守成国和崛起国的利益格局和要求,也涉及双方对彼此政策信号的主观认知。

总体而言,守成国对崛起国地位诉求的承认问题牵涉两个变量:守成国是否愿意给予地位承认,以及地位承认(否决)发生的区域。为了检验上述两个变量的作用及其发生的机制过程,本文对四个案例进行了考察,包括1870—1871年德国统一后确立大国地位、英美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的和解、英德在1905年之后的霸权竞争以及19世纪末英德在远东问题上的外交协商。这些案例突出了地位承认问题可以有力地塑造权力转移的结果。英俄两个守成大国迅速承认了德国统一后的大国地位,且该承认发生在涉及国际格局核心区域的中欧地区,地位承认促成了国际秩序的和平变迁。至此之后,俾斯麦领导的德国成了国际秩序的坚定捍卫者。与这一案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试图在触及英法殖民地核心利益的摩洛哥地区通过挑起冲突来伸张地位。在地位诉求遭到否决的情况下,德国和英国的矛盾迅速激化,并开启了通向一战的霸权竞争。处在这两个极端案例中间的案例是英德在远东的结盟谈判和英美在委内瑞拉危机上的博弈。这两个案例涉及的都是国际格局相对边缘的区域,英国对美国的地位承认促进了美国对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支持;相比之下,英国在远东问题上和德国谈判的失败,导致双方的互疑加深。

在中美战略竞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地位承认的视角提醒我们关注大国博弈的微观互动过程,尤其是日常外交。决策者的地位动机驱动他们通过他国展现的尊重态度来判断他国意图,并倾向于通过表达地位诉求来试探他国意图。这一动态因素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可能会格外突出,因为无

论是崛起国还是守成国,在此期间都会更加在意自身的地位。本文试图通过理论和实证案例说明地位承认问题可以有力地塑造权力转移的结果。这意味着学者们需要更加关注包括情绪、符号和心理认知在内的微观因素在大国外交中的作用。这一视角不仅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路径,对于我们把握当前的重大事件亦具有重要价值。